

总主编

冯天瑜
张艳国

【中华智慧集萃丛书】



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孕育出了光彩卓绝的“智慧”。这里所说的“智慧”，不仅仅是指知识、技巧、才能，它的更根本含义还包括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思维途径、认知方式乃至价值观念、人生态度、社会理想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中国智慧也可被认为中国文化的主干或内核。文化史研究表明，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，中国智慧在农业、天算、医学，特别是军事领域，获得了尤其长足的发育。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兵家韬略

何晓明 何顺进 编著



【中华智慧集萃丛书】总主编 冯天瑜 张艳国

兵家韬略

何晓明 何顺进 编著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养生要

知荣近辱

谋略经纬

文人雅言

人生箴言

家训辑览

学规菁华

官箴要略

和谐融通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兵家韬略/何晓明,何顺进编著. —武汉:武汉大学出版社,2007.10

中华智慧集萃丛书/冯天瑜 张艳国总主编

ISBN 978-7-307-05506-3

I. 兵… II. ①何… ②何… III. 兵法—中国—古代
IV. E892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42948 号

责任编辑:宋玲玲 责任校对:王 建 版式设计:詹锦玲

出版发行:武汉大学出版社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
(电子邮件:wdp4@whu.edu.cn 网址:www.wdp.com.cn)

印刷: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

开本:950×1260 1/32 印张:10.375 字数:239千字 插页:2

版次:2007年10月第1版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307-05506-3/E·10 定价:20.00元

版权所有,不得翻印;凡购买我社的图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质量问题,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总 序

时代的步履已跨越 21 世纪的门槛，现代文明不断创造出辉煌成就，上天入地，呼风唤雨，世界统一市场建立、全息式信息迅速传递等昔日的遐想，都渐次演为活生生的现实。然而，现代化带来的并非单向式的进步，而是善恶并举、苦乐同行、创生与毁灭双至的“俱分进化”过程，正所谓：“省忧喜之共门兮，察吉凶之同域。”（扬雄《太玄赋》）在人与自然、人与人、人与社会诸层面，今人都患着不轻的“现代病”，面临着若干不易突破的困局。此间的人类尤需反思，神交古人，听取历史这位导师的谆谆教诲，借重昔时积淀的智慧。

作为人类智慧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智慧，不仅是中国人的财富，而且也为域外所借重：《易经》成为德人莱布尼茨创立二进位制数学的启示，而二进制正是电子计算机的运作原理；《老子》的“有生于无”哲言为西方建筑大师提供了灵感源泉；《三国演义》是日本企业家从事商战的教材；美军将帅在海湾战争中星夜披阅《孙子兵法》，“声东击西”是其赢

得胜算的谋略……外人研习中华智慧并取得实绩，使国人闻之而怦然心动——难道我们不应当以双倍的热情、更高的灵性，继承、发扬先辈智慧，以推动现代化事业健康发展，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创造新的业绩吗！

出于以上思考，本丛书试图介绍“中华智慧之集萃”，以为时贤提供参考。

何谓“智慧”？狭义的“智慧”约指认识世界、改造世界的聪明、才智，与“贤德”相对称，故有“智性之知”与“德性之知”的分野。有些思想史家把西方文化的源头希腊文化称之为“智性文化”，把中国文化称之为“德性文化”。这当然是从东西文化关注的侧重点之异而立论的，并非说希腊不讲德性，中国不讲智性。我以为，区分“智性之知”与“德性之知”确有必要，如果两相混淆，则知识论与道德论便混为一谈，然而，强作两分，把二者割裂开来，又有悖人类精神的整体性。本丛书所介绍的“智慧”，并不全然限于狭义智慧，而涉及广义智慧，或曰“大智慧”，包举才与德，兼容智与贤。如此议“智慧”，或许更切近中华文化的本真面貌：中华智慧不限于“智性之知”，还包含“德性之知”，追求二者的统一，偏执一面、陷入偏锋者则每遭诟病——多智而无德者（如曹操）被斥为“狡智”的“奸雄”；有德性追求却丧失智性者（如宋襄公）则被视为不足取的蠢才，这两类人都不是中华智慧的代表。中国人所推崇的文化英雄（如周公、姜子牙、诸葛亮）都是智者与贤人的整合，是仁、智、勇的统一体。从此种“大智慧”视角方可逼近中华智慧的真髓。

何谓“集萃”？本丛书并非论著的集成，而是编者从“中华智慧”涉及的各个侧面（如立身做人的德行准则、处世创业的韬略谋划、莘莘学子的学规、官吏奉守的箴言，乃至生态

平衡、家训要义、养生之道，等等），分别纂集中华古典的相关精粹，并加以条贯、诠释。读者诸君手持一卷，春诵夏弦，即可获得中华智慧某一方面的概要；若通览诸册，则可观照中华智慧的大貌。当然，如欲升堂入室，摘取智慧之果，则不仅需要“读万卷书”，还得“行万里路”，因为大智慧的获得，是人生践履的结果，需要从知、行两方面潜下心来。编者愿与读者诸君共同循流探源，寻觅中华智慧的真谛，并虚心吸纳各种异域智慧，相互比较、彼此观摩，以求得在现代文明地基上的整合与涵化，达成中华智慧的创造性发挥。

冯天瑜

2007 年金秋

书于丹桂飘香的武昌珞珈山

前言 兵家韬略与中国智慧

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孕育出了光彩卓绝的中国智慧。

这里所说的“智慧”，不仅仅是指知识、技巧、才能，它的更根本含义还包括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思维途径、认知方式乃至价值观念、人生态度、社会理想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中国智慧也可被认为中国文化的主干或内核。

文化史研究表明，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，中国智慧在农艺、天算、医学，特别是军事领域，获得了尤其长足的发育。正因为如此，20世纪40年代的文化反省中，雷海宗、林同济合作写出了意味深长的学术专著《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》；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反省中，李泽厚着重强调：“中国四大文化（兵、农、医、艺）与培育中国智慧形式有关系”〔1〕

但是，具体而论，古典军事学与中国智慧

〔1〕 参见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·试谈中国的智慧》。

之间，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，雷、林、李及诸学界前贤，并无详论面世。为解此疑惑，笔者搜求爬梳，条分缕析，探赜索隐，感受良多，权且提出如下浅识，以求方家指正。

一、重整体之“势”

从思维方式上看，中国智慧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注重整体，长于综合，追求统一。与西方智慧亟亟于探究“此岸”与“彼岸”、物质与精神、灵魂与肉体的本质区别不同，中国智慧更乐于以笼统、直观的方式，论证“天人合一”、“知行合一”、“情景合一”，体现出一种朴素的整体思维的优长。

这一优长，在古代兵家的韬略中，具体化为对“势”的注重与阐发。兵家始祖孙武论道：“故善战者，求之于势，不责于人，故能择人而任势”。“任势”，就是强调从总体上把握胜利的枢钮，而不仅仅瞩目于战役布署、战术技巧等细节，“故善战人之势，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，势也”。〔1〕宋代军事学家许洞又进一步说明：“势之任者有五：一曰乘势，二曰气势，三曰假势，四曰随势，五曰地势”，既要扬威猛进，鼓足士气，又要善布疑兵，还要抓住战机，巧用地形。“用兵者乘此五势，未有不能追亡逐北以建大功也”〔2〕。

战争是关乎天文、地理、人事的庞大系统工程，所以自古以来，便有“天阵，地阵，人阵”〔3〕之说。古代兵家将三者统一于“势”的把握之中：“夫行兵之势有三焉：一曰天，二曰地，三曰人。天势者，日月清明，五星合度，慧孛不殃，风

〔1〕《孙子·势篇》。

〔2〕《虎铃经·任势》。

〔3〕《六韬·虎韬·三阵》。

气调和。地势者，城峻重崖，洪波千里，石门幽洞，羊肠曲沃。人势者，主圣将贤，三军由礼，士卒用命，粮甲坚备”〔1〕。既然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全面而非单一的，综合而非支离的，所以兵家强调：“夫竭三军气，夺一将心，疲万人力，断千里粮，不在武”，单靠武力是不行的。“智周万物而不殆，曲成万物而不遗”〔2〕，只有总体谋划，宏观决策，综合分析，统筹调度，才能克敌制胜。

“智周万物而不殆，曲成万物而不遗”，这就对军事统帅的素质，提出了全面的、高标准的要求。“用兵之道，先正其礼，次渊其谋，次择其人，然后详天地之利害，审人心之去就，行赏罚之公，慎喜怒之理，择进退之地，张攻伐之权，明成败之图，度主客之用”〔3〕。要驾驭如此复杂的系统工程，军事统帅当然不能是徒具匹夫之勇的莽汉鲁夫，而应该是具有广阔视野，全局胸怀，文武兼备，智勇双全的“通才”。《六韬·龙韬》提出“将有五材”：勇、智、仁、信、忠；吴起告诫“将之所慎者五”：理、备、果、戒、约；诸葛亮认为“将材有九”：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、步、骑、猛、大。诸贤说法各异，宗旨则一：只有加强综合修养，提高整体素质，才能造就优秀将帅。

立足于重“势”的整体思维，古代兵家对于战争终极目标的确认，也有卓异见解。战争以夺取最终胜利为目标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问题是对“胜利”如何界定，如何判别。古代兵家认为，从整体上（包括精神气势、军备器械、军队数量、

〔1〕《诸葛亮集·将苑·兵势》。

〔2〕《太白阴经·人谋下·沉谋》。

〔3〕《虎铃经·军谋》。

将帅素质、国家财力、外交关系诸多因素)彻底压倒敌人,迫使其放弃抵抗,较之斗智、斗勇、斗力,浴血搏杀,使敌降服,是更为完美的胜利。“故上兵伐谋,其次伐交,其次伐兵,其下攻城”,“百战百胜,非善之善者也;不战而屈人之兵,善之善者也”〔1〕。这种对于“全胜不斗,大兵无创”〔2〕境界的追求,是古典军事学的重要精华所在,也是中国智慧整体思维特征的典型体现。

二、因辩证之“机”

与整体思维模式相关,中国智慧的辩证法,也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。简要地说,它是实用的辩证法而不是概念的辩证法,是互补的辩证法而不是否定的辩证法。“它的重点在揭示对立项双方的补充、渗透和运动以取得事物或系统的动态平衡和相对稳定,而不在强调概念或事物的斗争成毁或不可相容”〔3〕。

古典军事学,是中国传统辩证法体现得最透彻、精粹的学科领域之一,而“正”与“奇”,则是古代兵家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对辩证法范畴。“善用兵者,无不正,无不奇,使敌莫测,故正亦胜,奇亦胜”〔4〕;“以奇为奇,以正为正者,胶柱调瑟之士也。以奇为正,以正为奇者,临书模画之徒也。我奇而示敌以正,我正而示敌以奇者,知胜者也。我奇而敌不知其

〔1〕《孙子·谋攻篇》。

〔2〕《六韬·武韬》。

〔3〕李泽厚: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》,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,第304页。

〔4〕《唐太宗李卫公问对·卷上》。

为奇，我正而敌不知其为正者，知胜之胜者也”〔1〕。

如果单纯作字义概念的辨析，奇与正的辩证法似乎并不太容易讲得清楚。但是，如果我们从中国智慧的特点出发，从把握胜负因素动态平衡的角度去理解，便可以找到古典军事辩证法中体现中国智慧的闪光之点：“因机而立胜”〔2〕。

关于“因机”与“奇正”用兵之术的关系，明人何良臣有一段论述颇为精辟：“得机略者，不逼人之穷，不攻人之锐，不启人之未及。必因其盛而致之弛，击其虚而待其废，取其无备而疾袭其迟。是以用兵之术，惟因字最妙。或因敌之险以为己固，或因敌之谋以为己计，或因其因而复变用其因，或审其因而急乘其所因。则用因而致胜者，不可言穷矣。”〔3〕

显而易见，所谓“惟因字最妙”，就是说把握“奇”与“正”的辩证关系，要害在于因人、因地、因事而制宜，切不可死背兵法条文。这方面的经典例证，可见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：韩信背水列阵，大破赵军，便是依据“陷之死地而后生，置之死地而后存”的法则，活用兵法，一反“右倍山陵，前左水泽”的惯例而用之，既正而奇，既奇而正，最终大获全胜，令诸将钦佩不已。

战场局势千变万化，辩证之“机”无所在又无所不在。古代兵家在丰富实战经验的基础上，总结归纳出若干规律。吴起称：“凡兵有四机：一曰气机，二曰地机，三曰事机，四曰力机”〔4〕，分别从指挥调度、扼守要塞、离间敌营、训练士卒等方面阐明“因机”的重要意义。明人西湖逸士以“无常”

〔1〕《投肤笔谈·兵机》。

〔2〕《诸葛亮集·将苑·机形》。

〔3〕《阵纪·因势》。

〔4〕《吴子·论将》。

来释“兵机”：“主客无常态，战守无常形，分合无常制，进退无常度，动静无常期，伸缩无常势。出没变化，敌不可测，此之谓兵机”〔1〕。清人揭暄论“机”，更为精审：“势之维系处为机，事之转变处为机，物之紧切处为机，时之凑合处为机。有目前即是机，转瞬即非机者；有乘之即为机，失之即无机者。谋之宜深，藏之宜密。定于识，利于决”〔2〕，不仅点出“机”之所在，而且指明“因机”之乘、失有诀，“谋机”之宜深宜密，言简意赅，启人心智。

古典军事学中涉及辩证法的内容，精彩纷呈，美不胜收。如讲擒纵予夺之计，有《老子·三十六章》的“将欲歛之，必固张之；将欲弱之，必固强之；将欲废之，必固与之；将欲夺之，必固予之”；讲战与非战之分，有《商君书·画策》的“以战去战，虽战可也；以杀去杀，虽杀可也”；讲敌我胜负之数，有《孙子·形篇》的“不可胜在己，可胜在敌。故善战者，能为不可胜，不使敌之可胜”；讲智愚勇怯之度，有《六韬·武韬》的“大智不智，大谋不谋，大勇不勇，大利不利”；讲立功争胜之道，有《兵经百篇·智篇》的“无功之功，乃为至功；不争之争，乃为善争”等等。如果将这些论述提升到认识论、方法论高度来剖析，宋人何去非的如下总结，颇能画龙点睛般地凸显兵家韬略所蕴含的辩证法精髓：“事物之理，可以情通，而不可以迹系。通之以情，则有以适变而应乎圣人所与之权；系之以迹，则无以制宜而入乎圣人所疾之固。是以天下事攻之成，常出于权，而其不济，常主于

〔1〕《投肤兵谈·兵机》。

〔2〕《兵经百篇·智篇·机》。

固”。〔1〕

三、贵人伦之“和”

中国智慧尤其注重人际关系的调节、和谐，注重仁义道德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价值与功用。在军事领域内，这也得到了强有力的贯彻。

《荀子·议兵》记录了陈嚣与荀况之间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：

陈嚣问道：“先生议兵，常以仁义为本。仁者爱人，义者循理，然则又何以兵为？凡所为有兵者，为争夺也！”荀子回答：“非汝所知也。彼仁者爱人；爱人，故恶人之害之也。义者循理；循理，故恶人之乱之也。彼兵者，所以禁暴除害也，非争夺也。”

在一般人看来，刀兵相交，生灵涂炭，似乎与道德伦理毫不相干。但是在中国智者眼中，议兵与议政并无区别，同样要“以仁义为本”，正因为如此，在先哲议兵的诸多著述中，有关仁义道德的内容，占了相当的篇幅。“圣人之用兵也，亡国而不失人心，利泽施乎万世”〔2〕；“攻伐之事，未有不攻无道而伐不义也”〔3〕。在以仁讨不仁、以义伐不义的前提下，尽管战争本身必然造成伤亡和毁灭，但其最终结局，仍然是符合中国文化的伦理原则的。其中的道理就在：“故夫兵，虽非备道至德也，然而所以辅王成霸”〔4〕。大军所向，“克其国不及其民，独诛所诛而已矣”，对于敌国的民众，仍以仁义为怀，

〔1〕《何博士备论·邓艾论》。

〔2〕《庄子·大宗师》。

〔3〕《吕氏春秋·振乱》。

〔4〕《管子·兵法》。

“举其秀士而封侯之，选其贤良而尊显之，求其孤寡而振恤之，见其长老而敬礼之”〔1〕，这才是仁义之战，仁义之师。

如果说兵争之事对于敌国民众尚且应该以仁义为本，以和为贵，那么，对于己方军民来讲，就更应该将“人和”置于首要地位了。吴起提出：“不和于国，不可以出军；不和于军，不可以出阵；不和于阵，不可以讲战；不和于战，不可以决胜”〔2〕。孟子总结出中国军事学的著名命题：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”〔3〕。诸葛亮进一步申言：“人和则不劝而自战矣”，否则，“将吏相猜，士卒不服，忠谋不用，群下谤议，谗慝互生”〔4〕，必败无疑。

谋求“人和”，君主应对前线将帅予以充分信任，使其拥有高度的决策自主权，“上不制于天，下不制于地，中不制于人”〔5〕，而将帅回报这种信任的最好方式，则是“将在军，君命有所不受”〔6〕。只有“无主于后”，方可“无敌于前”〔7〕，君主与将帅之“和”，妙在其中矣。

谋求“人和”，友邻部队之间，理应和衷共济，相互体谅。曾国藩论道：“欲求和衷共济，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。人之好名，谁不如我。同打仗，不可讥人之退缩；同行路，不可疑人之骚扰。处处严于治己而薄责于人，则唇舌自省矣”〔8〕。

〔1〕《吕氏春秋·怀宠》。

〔2〕《吴子·图国》。

〔3〕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。

〔4〕《诸葛亮集·将苑·和人》。

〔5〕《尉繚子·武议》。

〔6〕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。

〔7〕《尉繚子·武议》。

〔8〕《曾胡治兵语录·和戢》。

谋求“人和”，说到底是实现部队意志的绝对统一，“用百万如役一人”〔1〕，“三军一心则令可使无敌矣”〔2〕。做到这一点，“缘法而治，按功而赏”〔3〕固然是相辅相成的两手，但古代兵家更强调的，却是将帅须行“拊循之道”，将血亲人伦的道德准则，溶入军队内部的人际关系之中，“饥寒困乏，如以身尝，疾病医药，亲临诊视，解衣推食，哀死问孤，殓殁吮伤，恩逾骨肉”。要而言之，“以父母之心，行将帅之事，则三军欣从，万众咸悦”〔4〕，“人和”于是转化为无坚不摧的战斗力。兵民为胜利之本的道理，就在这里。

四、循实用之“理”

实用理性（或称实践理性）是中国文化的特殊品格。与此相关，与西方相比，中国智慧并不亟亟于抽象思辨的深邃、知性探求的透彻和对感悟能力的超越，而以重历史、重人事、重经验见长。这些特点，在实践性极强、容不得半点虚妄的军事学领域中，得到了极为鲜明的体现。

中国历史悠久，忧患迭兴，战事频繁，兵学遗产异常丰厚。据此，清人陈庆年论道：“欲明兵法，先明方略；欲明方略，先明史事。取古今战争得失之数，设身处地以求之，博习其故，可以得实理。”他论证这样做的必要性时说：“天下至大，事变至赜，一时所历，则拘于时；一地所习，则域于地；一事所经，则囿于事；一技所娴，则狃于技。欲穷其变，能有几何。”因此，惟有“观其已然之迹”，从历史中吸取启迪，

〔1〕《何博士备论·汉光武论》。

〔2〕《吕氏春秋·论威》。

〔3〕《商君书·君臣》。

〔4〕《草庐经略·卷一·拊循》。

方可“有古今无限之藏，无身世易尽之憾”〔1〕。以史为鉴，以前人为鉴，是中国智慧的重心所在，也是兵家韬略中最平实的法则。

历史由人所创造，因此，兵家韬略蕴含的实用理性的另一表征，便是对人事的高度关注。早在崇尚鬼神的流风余韵尚存的晚周，孙武就明确表示：“成功出于众者，先知也。先知者，不可取于鬼神，不可象于事，不可验于度，必取于人”〔2〕。在决定战争胜负的众多因素中，强调人的因素，是古代兵家一以贯之的认识。史籍记载，梁惠王问尉繚子：黄帝为什么能“百战百胜”？尉繚子回答：“刑以伐之，德以守之，非所谓天官、时日、阴阳、向背也。黄帝者，人事而已矣。”他进一步说明：一座城池，从东南西北都攻不下来。难道四个方向都没有可以利用的天时、地利方面的条件吗？显然不是。攻不下来的原因，只能是城高池深，兵器备具，粮谷多积，守军顽强。相反，“若城下、池浅、守弱，则取之矣。”他总结道：“由是观之，天官、时日，不若人事也”〔3〕。今天看来，黄帝“百战百胜”，更多属神话传说的成份，但尉繚子因梁惠王之间而申发的“天官、时日，不若人事也”的道理，却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至理名言。

人与历史结合，即产生经验。古代兵家将自己的全部理论，牢牢植根于实践经验的沃土之中。据此，他们一再强调，从实战中考验军人素质，选拔将帅人才，才是惟一可靠的途径。管仲提出：“言勇者试之以军，言智者试之以官，试于军

〔1〕《兵法史略学·卷一》。

〔2〕《孙子·反间篇》。

〔3〕《尉繚子·天官》。

而有功者，则举之，试于官而事治者，则用之”〔1〕。韩非子生动地比喻道：只看马的外形，伯乐也无法断言其优劣；只听人的言辞，孔子也无法判定其贤与不肖。惟有“试之官职，课其功伐，则庸人不疑于愚者”。他的结论是：“宰相必起于州部，猛将必发于卒伍”〔2〕。如果说管仲与韩非子所论，从正面阐发了兵家智慧的实用原则的话，那么纸上谈兵的赵括及其40万士卒被坑杀的可悲下场，就从反面促使一代又一代的军事家们感悟循实用之“理”的极端意义，刻骨铭心，永志不忘。

〔1〕《管子·明法解》。

〔2〕《韩非子·显学》。